

蒋大椿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王也扬

【提要】 蒋大椿在新时期之初,立足原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特别是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后,他又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尝试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这种尝试尽管不成熟,却代表了他的学术追求,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唯物史观 蒋大椿 新时期 改革开放

蒋大椿(1940—2015 年)是我国史学界在新时期较早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再学习与再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贡献为方家肯定。1963 年,蒋大椿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师从黎澍攻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其时由黎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两书已经出版,^①黎澍受教育部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委托主编教材《史学概论》,他要求参编人员和自己的研究生首先读上述两书。蒋大椿后来对人讲,自己高中时即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本科进历史系是学校分配的,而研究生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则遂了多年求学志愿,加之导师黎澍和老所长范文澜都特别强调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因此他开始下力气啃读当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我国陆续出齐,黎澍安排蒋大椿负责补充修订前述他主编的两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蒋大椿仔细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②这在当时史学界的学者中是比较少有的,为他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现在年轻学者一般不大了解 20 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学术氛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大潮澎湃的时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思,所以人们才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和再研究,为的是求得“真经”,口号是“回到马克思”。这也是蒋大椿 20 世纪 80 年代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研究系列论文的背景。他曾说,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过去史

①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 50 卷,从 1955 年到 1985 年陆续出齐,翻译底本是俄文版。1986 年我国开始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翻译底本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历史考证版,并参照德、英、俄多种版本,译文更加准确并有很多新文献资料问世。当时计划到 2020 年出版 70 卷,目前出版了 34 卷。蒋大椿晚年对此极为关注,多次和笔者讨论。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读得不够,对论与史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其症结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认识得不够清楚。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一文中,蒋大椿以简练明晓的笔触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认为马克思大约在1845年春天首先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次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完整表述了唯物史观。1847年,马克思与蒲鲁东公开论战,通过《哲学的贫困》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其后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系列历史著作则是将这一历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成功典范。这一史观得到正式命名是在1859年8月,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称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最初提出的,后来,恩格斯于1892年4月正式将这个历史观定名为“历史唯物主义”。^① 蒋大椿这段十分清楚的概括性表述,后来成了研究生们备考的提纲。

蒋大椿研究唯物史观,注重考察该学说的形成过程、思想源流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命题构建的思考、斟酌、修正与发展。在《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一文中,他说就唯物史观的形成来看,马克思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首先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出生于法律世家,大学读的专业也是法律,但他热爱的是哲学和史学。正是因为长期对历史学著作的钻研,使他面向实际,尊重事实,不尚空谈,最终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分道扬镳。他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关怀,导致他必然会走上为改变现实社会而斗争的政治道路。从柏林大学毕业,马克思本想留校任教,但普鲁士当局压制思想言论的做法使许多教师被解聘,他只得走出书斋,直面社会舞台,在《莱茵报》找了一份工作。在这份报刊工作中所经历的实际生活改变了马克思,两年后重回书斋的他,已经是带着社会实际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了。蒋大椿指出,在1843年底到1844年3月旅居巴黎时期,马克思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迈出了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一步。在法国历史学家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中,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事实跃然纸上。于是,他进一步深入钻研,发现了阶级存在的规律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② 马克思提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阶级斗争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③ 蒋大椿认为,唯物史观就是这样被正式提出来的。^④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蒋大椿等一批学者当年对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也紧密联系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实际。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⑤ 如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呢?蒋大椿在接受《历史研究》编辑部采访时谈了他的思考,他说: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片面和不够准确的地方,如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理解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这就很难说是历史唯物论的本意。唯物史观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基本原理,而阶级斗争学说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所总结出来的比较具体的历史理论。二者的层次不一样,故不能等同。一般来说,哲学理论抽象程度越高,适用面就越

①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② 蒋大椿:《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2页。

④ 蒋大椿:《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2页。

广;越低,则适用面越窄。以往我们将本来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扩大推及到适用一切历史研究,结果很自然地一方面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但应当研究的历史现象排除出去,造成研究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则把一些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一律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他还说:“当然,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屡屡强调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客观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斗争需要。”^①关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笔者曾经和蒋大椿有过商榷。笔者以为,阶级斗争观点不等于唯物史观,也不能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②笔者理解蒋大椿的思考,他所侧重的是历史哲学的不同层次,并且也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样,兼顾了“客观形势”的需要。笔者记得,关于这一问题,他琢磨了很长时间,还参与编写《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一书,^③试图厘清历史哲学与史学及现实之间的关系。尽管笔者不尽认同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但当年友好热烈的讨论气氛仍令人怀念。

在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除了历史学,蒋大椿还在导师黎澍的提示下特别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一文中,他指出,自然科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第一,自然科学对低级运动形式规律的揭示为认识人类社会这一高级运动形式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第二,自然科学脱离哲学而独立,使马克思努力创建的新历史观得以找到正确的研究出发点。第三,自然科学的发展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唯心主义。第四,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呈现的系统化综合化发展趋势,启发和推动了马克思采用系统研究问题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蒋大椿认为,正因为运用了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丰富充实了唯物主义历史观。^④

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有些年轻人热心寻求将自然科学新成就,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运用于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领域,蒋大椿支持了这种探索,同时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即走过这样的道路。然而,自然科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又有差别。马克思曾经认为,“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⑤但后来手稿中没有这句话,这说明马克思后来认为,历史科学只应研究人类发展的过程。^⑥黎澍则更加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意义,要蒋大椿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蒋大椿为此整理了一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运用》文稿交给了乃师。

二

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中,蒋大椿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

①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2页。

② 王也扬:《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③ 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④ 蒋大椿:《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⑥ 蒋大椿:《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表述的综合考察》,《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观进行历史研究。他援引恩格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赞赏德国历史学家梅林的新作说:“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①恩格斯还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②以往我国史学界也发生过恩格斯批评的那种情况,蒋大椿在反思中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看法。

首先,唯物史观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了这个前提,历史研究才能取得科学成果。蒋大椿指出,历史学研究对象有两个特点:其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事物;其二,历史学研究的不是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历史学只能凭借过去留传下来的历史资料。蒋大椿认为,要使历史研究的结果具有科学性质,应该做到三点:一是要从具体的材料着手;二是必须充分占有材料;三是要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去伪存真。^③

其次,唯物史观揭示了各种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使对历史现象的科学分析成为可能。历史材料纷繁复杂,看似理不出头绪,唯物史观却能解决这个难题。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等,是马克思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研究中抽象出来的,是对无数同类历史现象的共同性的高度概括。蒋大椿认为,尽管历史科学本身并不研究这些抽象的范畴,但历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的范畴就可将所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归类。^④马克思说,这些抽象的历史哲学范畴,“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是,“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⑤这便是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巨大优越性。

再次,唯物史观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因为它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内容的揭示非常全面。蒋大椿说,唯物史观出现以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内容一般都理解得很狭窄,而唯物史观出现以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及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思想领域,都成为人类历史的内容。蒋大椿强调,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内容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的一切历史的各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创造历史的人及其活动,才能对历史进行正确的叙述。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就“既要摒弃蔑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个人英雄史观,同样也反对各色以唯物史观面目出现的排斥个人历史创造作用的种种非科学的见解”。^⑥

最后,唯物史观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遵循一定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一切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就应把被研究的历史对象作为发展的现象来考察。蒋大椿认为,历史学著作无需泛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让事实来说话。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将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贯穿起来,以发现历史事实间前后的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⑦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3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③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④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⑥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⑦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据此,蒋大椿对史论关系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史与论应放在特定的范围中加以考察。从整个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史与论是特定意识形态中的两种社会现象,具体来说,“史”指历史科学,“论”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指唯物史观;从研究历史的过程来看,“史”指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论”则指对“史”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史识;从叙述历史的过程来看,则“史”指研究所用的史料,“论”就是历史著作中的观点、论点。蒋大椿认为,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述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史论关系进行灵活处理,但所有成功的历史著作,都做到了以唯物史观为前提、论从史出。^①

三

歌德说,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②意思是说,比起丰富多彩、不断发展、常绿常青的人类生活,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总是要相对滞后一些。因此,理论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在蒋大椿发表上述唯物史观研究系列文章20年后,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我们又见到了他的新作《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蒋大椿说,20世纪80年代中,自己是“回到马克思”论者。他回忆早年随黎澍读研究生时,一开始就阅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原著,由此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历程。蒋大椿认为,这两篇原著包含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重要的理论原则,如果照此继续研究探索下去,是会有大收获的。这些理论包括“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理论,以及不能仅仅直观地观察事物,还必须从主体及其实践来思考等理论原则,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做深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蒋大椿目睹了新时期的这一巨大变化,逐渐认识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环境变化本身也是人造成的。他认为,这种实践是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认识新时期历史时不可忽略的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较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在阐述传统唯物史观时,不少人没有读到这些著作,因此他们在强调生产方式的物质性的时候,对历史运动的主体即人及其社会实践研究不够。而新的社会实践表明,应该更重视对人及其社会实践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以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蒋大椿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实践通常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只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③

蒋大椿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反响和争议。^④这种争议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笔者有幸参加了讨论,就如何认识社会历史的规律、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如何认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社会历史的规律不能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简单等同,原因有二。其一,社会历史过程具有过程长、不可重复、不易检验的特点,且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发生和完结需要时间,其中的规律被证明和被检验也需要时间。其二,社

① 蒋大椿:《论与史的关系考察》,《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②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③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④ 参见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会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有意志,因此历史活动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而自然界的活动是无意识的。

笔者认为,历史发展是具有必然性的,但这种必然性不是平均地表现在历史活动的每一个方面,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如,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科学文化确实愈来愈发达,人确实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确实愈来愈进步,等等。而且,这种总趋势受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并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不能够代表和顺应这个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则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指的是被历史所抛弃的那些意志,而不是支配了历史发展方向的那些意志。

至于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既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其实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批评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对所有学说具有基本的历史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当时人类的最高认识水平还没有超出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的局限,与我们今天相差不止一个时代。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认识的飞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理论观点,而且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因此,对今天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回到马克思”,求得和捍卫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的“真经”已然不够,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才算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②

(作者王也扬,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730000)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王也扬:《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state since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They 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 of growing up in the debate between Zionism and post-Zionism, and they discuss topics such as Jewish history and Judaism, Zionism, immigrant movements, collectivism,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the Israeli state,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Israeli state. Based on this, they have constructed a new historical discourse with “revisionism” at the core. This discourse reflects the *Zeitgeist*, that is, the Israeli society has to reconcile with both expectat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While it needs to embrace the tradition, it must also face the future. These intellectuals are called “Post-Post-Zionists”. Their appearance symbolizes a turn in Israeli historiography, the adjustment and revision of historiographic methods,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new trend of Israel’s nation-state narratives.

Interpreting Anthropocen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the West // Zhang Zuocheng

From the 1970s to the 2010s, after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ists in the West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new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In the process, a trend for historical theories is to return to the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f the past such as works on Anthropocene (the Human Epoch). As a concept, Anthropocene originated in geology, and it is a geological time unit that labels the planetary history since 1800. 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focuses on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past through which to make sense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Following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the past, John R. McNeill and Dipesh Chakrabarty have respectively elaborated on the discourse of 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heory.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fer insights to get beyond Western-centrism and to shape a new form of historiography. The analysis of the Anthropocene discourse b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is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its meanings have certain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sts’ efforts to construct their own discourse system.

Jiang Dachun’s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Wang Yeya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period, Jiang Dachun’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d a great social impa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works, he especially explored how to apply materialistic view to guide historical research. Twenty years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again attempted to develop the theory o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following the Marxist line “practice-knowledge-again practice-again knowledge”. Although this attempt is immature, it represents his academic pursuit and demonstrates a valuable spirit of exploration.

Lin Tongj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China during His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 Dong Chenglong

Lin Tongji (Tung-Chi Lin), known as the co-founder of the “School of Warring States”, wrote his master’s thesi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Northeast China issue respectiv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He argued that there were two levels of “Tianxia” corresponded to civilization and geography; one was the “head quarters of Tianxia Proper” equal to the areas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other encompassed areas of the barbarians as the “frontiers of Tianxia”.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levels of “Tianxia” drove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Specifically, the Northeast wa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people and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barbarians. The leading principle for the Middle Kingdom’s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was to unite the eastern barbarian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Sinicization against northern barbarians, i. e. , to “control barbarians with barbarians”. The Qing Dynasty followed this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ed a basic pattern of rule by the Manchu, Han, Mongolian, Hui and Tibetan groups. Conscious of the “New Warring States Era”, Lin drew extensively on the works of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upholding the theory of Sinicization. He also transcended the Great Wall to fully acknowledge contributions of frontier tribes and the Qing dynasty in framing modern China’s ge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he avoided the bias held by some researchers who overemphasized frontier characteristics. By doing so, he helped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